

经济学家

学术顾问:(按姓氏拼音排序)

巴曙松	蔡继明	陈东琪	陈栋生	程恩富
迟福林	戴国晨	范恒山	樊 纲	高尚全
顾海兵	谷书堂	贺茂之	洪银兴	黄范章
贾 康	江春泽	金 碚	李成勋	李江帆
李京文	李维安	刘诗白	刘 伟	茅于軾
任玉岭	宋洪远	宋守信	宋养琰	谭崇台
王东京	卫兴华	魏 杰	吴 澄	徐长友
晏智杰	杨家庆	杨启先	张曙光	张晓明
张卓元	赵人伟	郑新立	朱铁臻	周叔莲
周天勇	邹东涛			

中国产业升级必需的制度环境

■ 陈志武 耶鲁大学金融经济学教授

关于产业升级的话题,国内媒体谈得非常多。为了准确起见,先做一个定义,什么是产业升级?不同的人有不同的定义,我的理解是,产业升级能够提高企业的经济增加值,提升企业赚钱的能力,给员工带来更高的收入,给股东带来更多的回报,同时给社会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这是大致的一个定义。

前些年有一个大家谈得比较多的话题,是中国需要卖掉 8 亿件衬衣才能换来一架波音飞机。这个话非常重要的一个含义就是,中国在产业链上必须要提升,让我们能够尽量花更少的时间,卖更少的苦力,照样能够赚更多的钱。

产业升级过程中会有哪些必然面对的挑战?为了说明这一点,我给大家看张图。

勤劳会抑制产业升级,还是美德吗?

有关资料显示,1998 年不同国家的劳动者在一年里平均工作的多少小时最近的数据也差不多。欧洲的荷兰人工作的时间是最短的,是最不勤奋的,平均一年工作 1350 小时。这就是为什么我去荷兰,不管是阿姆斯特丹,还是要海牙,特别是周六日去的话,在城市里基本看不到一个人,大家都去玩了。第二最不勤奋的是法国,一年大概工作 1400 小时;美国人工作 1650 小时;中国人一年工作 2200 小时。有一个国家在资料没有给出来,就是韩国,韩国人一年工作的小时数量大概是 2800 小时,比中国人还勤奋。

结合 2001 年不同国家的人均 GDP,也就是人均收入,工作勤劳程度和人均收入基本是负相关的,工作小时越多,越勤奋的,收入总体上略低。反过来看,收入越高国家的人恰恰不需要工作那么多。

我主要想说明两个意思:第一是,原来中国人总说勤劳是美德,但我要说,今天世界上,勤劳已经不再是美德,实际正好是反过来的。这个道理蛮简单的,大家都去参观过太阳能制造公司,电器,包括手机制造公司,就会知道很多的公司本来可以用更高的技术,自动化的生产线来生产东西,但是它们不想那样做,因为一条太阳能制造生产线要花 1000 多万元美元,前期资本投入很大,而用自动化设备生产太阳能设备的时候,报损率比工人做的报损高很多,这使得整个成本又上升很多。这样一来,选择是很明显的。中国更多的企业家会选择用人工,而不是用更先进的自动化设备。

产业升级的条件:全社会已经比较富有

当然这有一个前提条件,就是人工必须很便宜,如果劳动力成本太高了,中国人就不会没日没夜的拿一点钱就愿意干活了。这就是为什么现在回头看,中国之所以在产业链上没有向更先进、增加值更高的一端转移,其中很重要的原因就是中国人太多,太勤奋了。换句话说,太勤劳是给中国社会帮了倒忙。几年前我就经常开始说,为了给国家多做贡献,多休息一下,多度假。

各国的人均收入是很不一样的。学过经济的人都知道,如果每小时赚的钱本来就很少,



结合 2001 年不同国家的人均 GDP,也就是人均收入,工作勤劳程度和人均收入基本是负相关的,工作小时越多,越勤奋的,收入总体上略低。反过来看,收入越高国家的人恰恰不需要工作那么多。

稍微一点创新,都不需要革命性的创新,只要能现在每小时赚的钱多一点点,就会有有很多的激励做这种创新。而像荷兰人、法国人、欧洲其他国家的人,他们每小时的收益本来就非常高,他们所要从事的创新,产业升级,在带来收益方面的要求,会比在中国和其他的发展中国家要高很多。

这说明,产业升级的前提条件是,全社会已经比较富有。如果全社会收入还是非常低的话,高增加值的产业升级就不太容易实现。所以这就是为什么回头来看看,二三十年以前,在中国谈论产业升级的频率不是那么高,现在随着中国人的收入越来越高,对产业升级的需求和认知大大提升。

产业升级的制度障碍

话说回来,是不是一旦变成高收入国家,就能做到产业升级呢?当然不是。为了说明这一点,下面就四个方面做简单的交流。

第一,中国要真正实现产业升级,首先面对的障碍就是,政府在经济中的地位到底有多大。举个例子,苏联在 80 年代的时候,人均 GDP 超过了 1 万美元,比中国现在的人均 GDP 还高很多。但是苏联的创新给今天的人类社会留下了多少东西呢?可以说很少。

离我比较近的一个例子,是中国国防科大研发的银河计算机系列。我之所以喜欢举这个例子,因为我 1983 年到国防科大读研究生,整个学校都非常兴奋,把银河 I 巨型计算机的消息向社会公布了。可是国家花了那么多的钱,做了那么多的技术创新,给中国经济到底带来什么价值?照我说,银河计算机给中国社会唯一的贡献就是,未来的计算机博物馆有了更多的展品,除此之外,没有哪个企业会愿意花那个钱去买银河计算机。

一种是完全由政府主导的产业升级,还有一种是完全市场主导的,私人资本主导的创新,带来的结果非常不一样。为什么?私人出资的时候,如果是做 PE 基金的,或者是创投、VC 基金,有人跟你说有一个很好的想法,很好的技术,请你拿出几千万美金,或者是几亿人民币来投资,给你一些股份。你作为投资职业人士,一个本能的反应就是问他,这个技术能够带来多大的市场,收入增长前景怎样。而如果

不同的政府部门掌握资金安排,它关心的不一定是市场需求、增长前景,更多的是非经济的,政治的,还有其他的一些虚无缥缈的指标。因此说,国家出资和民间资本主导的创新,产业升级的结果很不一样。

第二个很重要的挑战,是地方政府和国有经济主导的经济结构和增长模式,也非常不利于产业升级。2008 年金融危机以后,中国的 4 万亿刺激方案中,90%以上的钱是地方政府和国企来花,而在国有经济占比几乎可以忽略的美国,奥巴马总统 2009 年推出的 8 千亿美元的刺激方案中,政府花的钱不到 10%,剩下的 90%多都是给民间的家族,老百姓和个人家庭,还有一些私营企业。是国有企业和地方政府唱主角,还是私营经济唱主角,最后对资源的配置也会很不一样。企业产业升级能够得到资金支持也很不一样。

举个更近期的例子。今年 1—8 月份,在中国有 1482 家非金融企业发行信用债,总共是 3.15 万亿人民币。其中只有 267 家是民营企业,总共发行了 1781 亿,占比不到 6%,94%是由国有企业发行的。从融资成本来看,同样是 AA 级一年期的信用债,国企只需支付 5.85%的融资成本,民营企业要 6.66%。同样是 AA- 级的一年期信用债,国有企业需要支付 6.69%的融资成本,民营企业要付 7.78%。

尽管今天中国有 800 多万家公司民营企业,占企业总数的 80%多,城镇就业贡献率是在 80%—90%之间,尽管它们产业升级的过程中的作用是这样大,但是它们得到的金融资源支持那么少。

从这一点也可以看到,如果国有企业不民营化、民有化,那么产业升级的难度就很大。

第三方面的制度障碍,是银行和债券市场也明显偏向国有企业,连股票市场的上市机会也是如此。即便是对于能够上市的民营企业,发审委员会对这个企业的有形资产也非常关注,如果这个公司没有什么楼盘,也没有土地,设备也没有,它们就会提出一些具体要求。这些对于产业升级也是非常大的障碍。我们可以想想,医药公司,或者现在的互联网公司,比如腾讯等等,本来不需要非常多的有形资产,非要在上市之前和之后,把多少百分比的资产放在有形的东西上,必然会减少公司在知识产权研发方面的投入。因此,目前的上市制度、偏

好,都会对产业升级构成很大的负担。

除债券和银行以外,法院系统也是很大的障碍。国内法律对真正掌握知识产权、拥有专利的公司非常不利,因为所有举证责任,都放在知识产权所有者一方,变相地对侵权一方提供了支持。这些司法安排对产业升级也构成一些障碍。

最后,从微观层面说,产业升级需要更加细化的专业分工,要求更多的企业把资源放在主业上,而不是跨行业什么都做。这些年,我在国内很多地方见到很多上市公司,不管主业是做电脑的还是做航天的,都有酒店,都有房地产公司。

越是什么都做的公司,在产业升级方面就越处于弱势,因为它没有办法跟专业集中的,火力集中的企业竞争。举个例子,大家知道美国的页岩气革命,有些人预测,到 2040 年,美国非常规天然气将占总天然气产量的 80%。为什么页岩气革命会发生在美国,而不是中国、中东,也不在委内瑞拉等石油和天然气资源丰富的地方?一个重要原因是,美国石油行业、天然气行业分工非常细,大大小小的石油公司有 8000 多家,而在中国只有 3 家。

这 8000 多家大大小小的石油公司是页岩气革命一个重要的基础条件。设想一下,国内 3 家石油公司里的工程师,如果有一个很好的想法,去花更少成本钻更多的油,要让这个想法通过审批,条件非常严,程序非常长。一般来说要做一个新技术的实践,可能最后要董事长才能拍板。相比而言,美国 8000 多个大大小小的石油公司中,只要中间有一家愿意给你的想法提供机会,做那个试验的话,这个想法就有更好的机会。

大家可能会问我,把所有的火药,子弹都用在主业上,对于产业升级,对抗风险,真有那么大影响吗?这里有一张图,反映的是在美国多元化的公司和主业集中的两大类公司,从 1990 年到 2007 年金融危机之前,现金占总资

产的百分比有多大的差别。

在金融危机之前,主业集中的公司,现金占资产比重超过 30%,而多元化大财团的现金只占资产的 15%。我们可以想到金融危机来了以后,哪类公司更有实力对抗金融危机的冲击,肯定是手头现金越多的。

从 1984 年到 1997 年,美国的 4000 家最大的上市公司,平均每家涉及的行业板块数量,从 3.2 下降到 2.6。美国公司和欧洲公司越来越专注,只做自己的主业不做其他的。

而中国的沪深 300 指数成分上市公司,从 2004 年到 2010 年,平均每家涉及的产业行业板块数量从 2.44 上升到 2.85。很多非上市公司什么都做的趋势也越来越强。

专业程度越高的公司,对产业升级投入会越多。我熟悉的一个不大的上市公司,下面有 50 家子公司,最近很多子公司的总经理都跑掉了,搞得公司董事长整天面对子公司高管离职,又要去招人。我发现 50 个子公司的管理中,能够留下来的都是二流的管理者。因为有 50 个子公司,又担心“摆不平”,集团不会愿意为其中任何一个花很大的本钱,真正一流的人也就很难留下来。

这说明一个简单的道理,一旦什么都做,必然就意味着为了平衡整个局面,就不可能什么都做得很好;反过来,如果只做一项,那么在这一项上,不管谁来跟你竞争,你都可以比他们出更高的价钱,把最重要的人才留下来。

冯仑讲到过野蛮增长的年代,在那样的时代,盲目多元化没有问题,因为做什么都可以赚钱。但是在中国经济进入结构性减速以后,谁赢谁输,不再取决于做了多少行业,而是取决于谁更能集中火力,把业务做细做精。这将决定哪些企业在“新常态”的环境下,在产业升级方面能有更大的投入。

(本文为耶鲁大学金融经济学教授陈志武在 2014 年英国《金融时报》中国高峰论坛上的主题演讲。)

本报第二届“(2014)中国经济学人”评选启动

为推动中国经济学理论与实践的发展,本报拟在“2013·中国经济学人”评选活动基础上举办第二届“(2014)中国经济学人”评选,自 2014 年 11 月 2 日起正式启动。参评者应具备以下几个基本条件:其理论具有原创性、实战性、时效性、前瞻性和首发性;在本报至少发表过一篇论文;具有一定的社会影响力。欢迎具备条件者踊跃

参评。新送参评(参考)作品请发至本报投稿信箱,来稿请注明“参评参考作品”。邮寄作品请寄至:北京市海淀区中关村南大街 46 号东区一号楼 113 室,邮编 100081。参评稿收稿截止日期(以发送日期和邮戳日期为准):2015 年 1 月 15 日。

经济学家周报专家委员会
2014.11.2

经济学家周报“2014·经济学人评选”基本规则

- 1、成为“经济学人”的基本条件是:
其一,原创能力强,学术水平高;其二,理论实战性强,甚具可操作性;其三,应用时效性强,社会影响力广泛而深远。
- 2、本评选系整体评价个别“经济学人”,而不只是哪一(几)部(篇)论著或哪一(几)个别观点、论点。
- 3、关照各个学术流派,各个领域。学者:老、中、小兼顾,文论:长、中、短皆宜。
- 4、不搞“终身制”,一年一届;随时上车,随时下车。
- 5、本次评选纯系公益活动,不收任何

- 费用,也不设任何奖项。
- 6、人数设定:“年度人物”,十名;入围者,30 名。
 - 7、入选条件以披露规则为准,保留最终解释权。
 - 8、本次活动完全匿名进行,不公开评委会、专家名单。
 - 9、本次活动坚持公开、公平、公正原则,名单揭晓以本报公开披露为准。

《经济学家周报》
2014.11.2

2014 名家对话:打造威海经济转型发展新模式在威海市举行

■ 逢娜

日前,由《经济学家周报》与超飞巨英联盟联合举办的以“保持‘战略定力’、打造威海经济转型发展新模式”为主题的《经济学家周报》2014 名家对话在威海市五星级海悦建国酒店盛大召开。大会期间,威海宣传部、威海市委办展办政要,中国银行管理层、哈工大经济专家学者、商界精英汇聚一堂,为沿海地区蓝色经济的发展献言献策,中央军委办公厅原理论秘书、清华大学新经济与新产业中心首席专家著名经济学家《经济学家周报》主编管益忻教授作为主讲人在会上表示,当前国内外经济环境十分复杂,要坚持统筹稳增长、调结构、促改革,且把稳增长放在第一个重要的位置上,并发表题为《关于第三次工业(制造业)革命的若干战略转》、《强化“战略定力”,打造威海经济转型发展新模式》重要报告。他指出,在时代坐标上,从第二次工业革命向第三次工业革命转变;第三种制造模式到来。并从运营模式、加工对象、消费

主体、企业评价、交易主导定位、企业微笑曲线定位进行了详细分析。

管益忻教授强调,这次会议是贯彻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国家治理体系、治理能力现代化指示精神的迫切需要;是进一步贯彻自“稳增长、调结构、促改革”战略思路的迫切需要,也是我们沿海区域企业、产业集群、开发区等如何在“新模式”稳增长下,跟上时代的步伐,奋力打造崭新的运行发展机制的迫切需要。

他还在主题为《强化“战略定力”,打造威海经济转型发展新模式》的报告中强调,强化三大“战略定力”,打好转型升级版威海战略发展新模式的基础和平台;强化“新常态”、“保增长”、“释放转型红利”定力。在战略创新模式上,大抓由仿创向原创转型升级;在混合经济机制打造上,大抓多元化转型升级,从单一所有制模式向多元化、混合化模式过渡。在产业链机制优化上,大抓微笑曲线转型升级,尤其针对威海经济,他提出威海要在新型城镇化模式打造上,从单层面城市化向多层面、多中心



模式转型升级,解决腹地狭小问题,学青岛港打造“旱码头”模式的经验,多层面、多类型“副中心”的设置与探索。在应对中日韩自贸区发展模式上,大抓主动、变通转型升级;从视角上对已有安排做出重新审视,优化提升,打造迈向中、日、韩自贸区的威海拟拟发展模式。

管益忻教授深入浅出地分析了威海企业、产业集群、开发区等如何在蓝色经济转型中,强化“战略定力”,奋力打造威海经济转型发展新模式,打造崭新的运行发展机制。他着重强调了第五个现代化的正确性和必要性,在“稳增长、调结构、促改革”发展战略指导下如何深化威海经济发展模式,特别是海洋商业模式,大搞国际化飞地临港产业发展发表了自己的见解与看法,对威海经济的发展意义深远。

管益忻教授是著名的经济学家、研究员、教授,著名战略管理与企业文化学家,著名城市战略规划专家,理论+实战派企业咨询专家,《经济学家周报》主编,清华大学新经济与新产业研究中心首席专家。